

安貧淡薄不居功

——鄧統元老師九旬華誕說人生

黃潔玲

「當教師最重要是有教無類，千萬別小看一名學生，只要老師不放棄，再差的學生都可發揮出潛能。」在大學修讀教育系，畢業後第一份工就是當教師，並以此成為終身職業，側重發揮學生潛能，為香港教育工作獻上全部心力，這正是鄧統元老師的崇高心願與實踐。



▲ 90歲時(2014年)接受校友會訪問

培養學生全面發展

鄧老師先後任教多所愛國學校，當問及在母校任職時的印象，今年已屆90高齡的他，卻毫不猶豫地回答：「中華中學有著優良的好傳統，中華精神更值得發揚光大。中華創校於1926年，正值北伐戰爭之後，學

校創辦人黃冷觀先生為培育新一代國家優秀人才而辦校，與時並進。其後，日本侵華，香港淪陷，學校輾轉遷至廣西，也堅持繼續辦校。學校的辦學方針從一開始就重視學生在德智體方面的全面發展，注重教授課本知識之外，

亦側重培養通才。及至後來，還通過教師晚上的家訪，與家長建立緊密的聯繫，做到家校共同引導學生學好本領及修養品格。與此同時，學校同時強調學生體能訓練，並充分運用在羅便臣道校舍的優良環境，師生利用課餘時間，把校舍以外長滿雜樹野草的校園，開闢成標準的田徑場與籃球場，為學生提供體育鍛鍊和競賽的場地。此外，又舉辦定期的1600



▲ 在爬山比賽的終點站龍虎山，設有工作人員等候



米長跑（路線：旭蘇道→干德道→衛城道，最後折回羅便臣道），及年度性的爬山比賽，賽道是由校園正門旭蘇道起步，登上克頓道至龍虎山，再跑回起點，以操練學生體魄。為此，中華體育健將頻出，個人與團體賽都經常問鼎學界體育運動會。」

鄧老師接著指出，基於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畢業生的家國情懷十分強烈，1949年前的畢業生，部分毅然返回內地，投身抗日戰爭，甚至在戰場上獻出了年輕的生命，芬先生（暱稱黃祖芬校長）的弟弟黃祖雄校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49年後，有更多畢業生返回內地升學及參加國家建設，梁愛詩校友的哥哥，即梁狄剛校友後來就成為國家開採石油的著名地質專家。大家更耳熟能詳的就是董建華校友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任行政長官，而梁愛詩校友則成為首任律政司司長。他們的傑出成就，最能驗證中華的教學理念。

薪酬微薄「十年九遷」

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私人辦學十分艱苦。在殖民統治時期的香港，愛國學校經濟上得不到政府任何資助，教師工作繁重，薪金菲薄，生活艱辛。鄧老師在白天要講課及處理校政，課餘需開會及組織學生課外活動，到了晚上還需進行家訪，每天都是夜以繼日地工作。1959年鄧老師與任教於漢華中學的陳玉嬋老師共諧連理，婚後的十年間，基於樓宇的租金不斷上漲，出現了「十年九遷」的不安定局面。「記得在新婚時，一個細小的單位，租金已花去了大部分薪金。」談到這裡，鄧老師帶著遺憾地表示：一對年幼的兒女實在無暇照料，與太太商量後，把他們送返鄉間由親戚照料，直至小學畢業為止。

眼疾困擾 忘我工作

工作繁重與經濟拮据固然是對鄧老師的考驗，惟更大的困難是眼疾對他的長期困擾。但凡認識鄧老師的校友，都不會忘記他是位深近視老師，加上工作時間長，長期休息不足，終於在1979年罹患白內障，當年接受手術後並未有植入晶體的技術，未能得到徹底的治療而留下後患。醫生雖叮囑他要持續休息三個月，但由於教學及行政職務繁忙，僅休息一個月又返回工作崗位。不久便出現右眼視網膜脫落，而導致右眼失明。翌年他的左眼亦因年紀大視力差，出現了眼球部分退化的跡象，從八十年代開始，他的左眼視力只餘正常人的十分之一，視力從此變得模糊，至今看東西甚感吃力，亦促使了他擅長聆聽人聲來辨認親友的能力。

芬生關懷 格外感激

源起於先天的視力缺陷，加上後天的操勞，固然為鄧老師帶來不少肉體與精神上的痛苦，然而，凡事皆有兩面，正是由於他遭受眼疾的折騰，亦使他更感到同事的關懷與學生的愛護，談到這裡，在鄧老師久歷滄桑的臉上，泛起了格外感激的神情：「記得我在臥牀養病時，正值炎夏之際，躺在牀上



▲ 黃祖芬校長(左三)、鄧老師(右二)與友校校長合照

感到又焗又熱，不時冒汗。就在此時，芬生到來探訪，給了我很多鼓勵與安慰。更萬萬沒想到的是，芬生在翌日便著人送來冷氣機，並隨即安裝使用，使我的養病生活頓時舒服起來。芬生關心師生的故事我們經常聽到，這次自己受惠，感受就更深了。」鄧老師還提到，在漢華任職時，他租住在學校附近一幢樓宇內。「某天，這樓宇有個單位失火，學校的老師遙看到樓宇冒出了濃煙與火光，就立即跑過來，協助我避到安全的地方。從同事們焦躁的神情與關切的目光，使我感受到有如親人的關懷。還記起我每當要搬家時，同事與學生知道後，就主動幫忙搬運的工作。所以，愛國學校工作儘管艱辛，但人與人之間卻真誠相處，和諧融洽，精神上十分快樂。」

師生愛校 教人感動

為此，鄧老師認為當年的教師團隊所具備的承擔和犧牲精神十分難能可貴。他特別提到，六十年代中期，中華中學在羅便臣道的校舍遭到業主迫遷，



在沒有固定校舍上課的惡劣條件下，教師們不但沒有離職，大部分同學沒有轉校，更在芬生親自帶領下展開籌款與建新校舍的宏圖。芬生社會人脈廣泛，親自奔走呼號，悉力邀請社會熱心人士募捐；全校師生發動家長與親友應捐；各班同學積極義賣家長捐贈的大批茶葉與品牌藥油；教師縱然薪酬有限，卻自願認捐個人薪金數月不等，並提出從每月支薪中逐步扣還，不少老師的扣薪期長達數年。這種師生愛校如家的表現，實在叫人感動，他也引以為豪。



▲ 假日與同事們遊船河作樂

見證歷史 終身難忘

退休 21 年的鄧統元老師，當回首 50 年執教生涯的得失、喜悲時，又有何人生的感悟？「我最難忘的經歷是在 1984 年，能以教聯會會長的身份獲邀參加觀禮團，和香港各界代表團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見證了我國總理趙紫陽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正式簽署《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這個具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鄧老師不假思索地回答。不錯，鄧老師作為



▲ 1984年赴京見證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一刻，使他感觸最深。

一位文史科教師，格外能宏觀細味歷史的變遷，對於英國在香港殖民統治劃上句號的歷史時刻，能作為見證人之一，是何等難得！用他的話說：「過去數十年教學生涯中，在講述有關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等列強侵略，使我國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慘痛經歷；想到百多年前滿清朝廷、北洋軍閥政府

等那種喪權辱國的可恥場面；想到自己因走避國民黨白色恐怖、來港從事教育工作，長期遭受無理歧視、限制和打擊的遭遇；也想到廣州三元里平英團、太平天國、義和團等人民前仆後繼，抵抗外來侵略，反對專制統治的英勇事跡……因此，見證聯合聲明的簽署，叫我感觸良多、終身難忘。」

此外，在 1993 年退下杏壇後，鄧老師考慮的是如何發揮餘熱，團結教育界退休人士，從而繼續為香港社會出力？為此，他與行內朋友一起商議，順利籌組了一個教育社團——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成立初期會員人數只有數百，時至今已發展到接近 6000 會員。與此同時，亦積極開展會務，致力充實會員生活、調節身心與促進友誼。」鄧老師感到這個聯誼會的工作很有意義，令退休同工有了新的寄託與發揮，至今仍津津樂道。

校友關懷 猶如兒女

令鄧老師窩心的事，還有在退休以後，特別在近十年已是「深居簡出」的狀態，依然得到昔日同事與眾多校友的尊敬、關懷，在假日到來屯門黃金海岸探訪。尤其是他擔任過班主任的健社同學，每年春節期間都聯袂到來拜年、問安，其關切之情與親生兒女無異。且更多的校友惦記著今年是他的九



▲ 與到訪校友合照

旬華誕，先後上門祝賀。一次又一次的長談或短會，都是真情流露，使鄧老師感受到中華、育華乃至其他校友師生那種特有的永恆情誼。

至於提到人生憾事，鄧老師感到最大的遺憾莫如是眼睛的毛病。他臉帶無奈同時嘴角又掛著微笑地說：「早年因病幾次入院動手術，想不到多年來不見的學生紛紛聞訊探望，慰問不單宣之於口，更親身幫忙照顧，如處理大小二便也不嫌棄，真的猶如親生子女。他們的表現，就連醫護人員都受到感動。」他認為患眼疾固然是不幸，但因此而得到師生的愛護卻是一種福氣。



誠然，要是沒有疾病的困擾，可以為學校、學生做更多的事情，或把事情辦得更好呢。

此外，對於一對子女他也感到有所虧欠。「作為兒女的父親，可以做的事情多著呢，特別在他們年幼的時候。但在當年實在難於兼顧，為了愛國教育、為了更多的孩子，只能捨棄小我，成就大我，把他們送回梅縣去。當他倆回港唸中學的初期，基於學習上出現適應的困難時，對父母曾有點抱怨，為此我也力作修補。時至現在，他倆早已完成了高等教育課程，分別在商業機構及會計行業有所發展，我也深感安慰。」

「學校停辦，可惜！」

這時，鄧老師帶點感慨地說：「學校停辦，可惜！」「一家這麼好的學校，因一次意外事情的發生而被取消註冊，實在可惜！」鄧老師追溯地說：「我在中華一直擔任教導主任，記得在意外事件發生前的周會堂上，我就對全體師生說得很清楚，大致的意思是香港愛國同胞的抗爭是為了維護民族的尊嚴，但絕不主張偏激、包括任何暴力行為。及至意外事件的發生，校方實毫不知情。在事件中構成對學校、對學生的傷害，作為學校教師的一員，我感到百般的無奈與難過。」

教育生涯 無怨無悔

對於走過的九十年人生旅程，鄧老師如何評說？「教育生涯雖清苦，教書工作雖繁忙，惟一直感到無怨無悔，也樂於如此；而眼疾的折騰，亦本著既來之則安之的平常心對待。即使在工作最艱難的時候，也想著盡力而為，而辦妥了的事情，從沒有計算功勞孰大孰小，也不習慣與人比較，只求心安理得。」

先賢有云：「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這種襟懷在鄧老師身上也許能有所體現。勤奮公事，淡薄名利，臉上總是保持樂呵呵的笑容，就是這位可敬老師數十年的處世態度。於此，謹祝鄧統元老師健康長壽！

（原載校友會會刊《國光》2014）

鄧統元小傳

廣東梅州市人，1943年中學畢業後在梅城小學任教。1949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教育學系，即留任助教，時遭軍警圍捕中山大學師生，為安全計而避居香港。來港後，先入漢華中學工作，1957年到中華中學任教歷史等科目，在授課之餘，兼任學生輔導工作，後擢升為教導主任，工作共達12年。1969年以後，歷任福建中學、福建夜中學副校長、校長及執行董事；漢華中學副校長及育華中學校董。1975年參予籌組及成立教聯會，並先後出任秘書長、副理事長、會長及名譽會長等職，直至1993年榮休。及至1997年作為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創會人之一，歷任第一、二、三屆會長、名譽會長、董事會主席；2014年獲該聯誼會頒董事會榮譽主席銜。



▲ 入職母校時的形象

與此同時，不斷在報刊發表教育及時事評論，並為多家出版社編著歷史教科書。1993年在北京中央教科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及武漢華中師大港澳台研究中心擔任特約顧問。1997年任《中國社會力量辦學大辭典》顧問及編委，負責撰寫及審閱有關辭目。2004年參與《香港教育發展歷程大事記》編寫工作。



▲ 與太太陳玉嬋女士